

民
国
的
政
治
逻
辑

民国政治逻辑

邓野 著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

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

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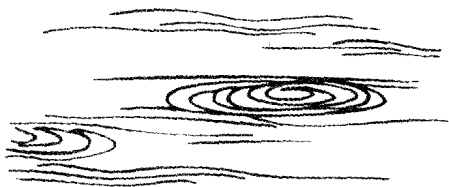
1944—1946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民国的 政治逻辑

邓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的政治逻辑/邓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97-1808-7

I. ①民… II. ①邓…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722 号

民国的政治逻辑

著 者 / 邓 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特约编辑 / 邓 晨 印志凤

责任编辑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排 版 / 润之源工作室

印 刷 /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 32

字 数 / 50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808-7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还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笔者开始涉足中华民国史这一学术研究领域。

所谓中华民国史，仅仅从名称上就可以直观地显示，这是一项与政治的关系相当密切的学科。在这里，政治与学术两者之间，往往浑然一体，难分彼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关系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由于这种特殊现象的存在，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具体而论，两者是统一，还是独立。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题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多次称国民党及其政府是法西斯主义，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等等。然而，在中共内部对这一报告作解释和说明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1〕

国民党究竟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半法西斯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这里不作深究。问题在于：一个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是半法西斯主义的政党，为什么却偏偏不按科学的定义表述，而是要非科学地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所言，实际上就是指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及其区别。

政治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尤其着眼于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要将半法西斯主义称为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便在于“免得为他们张目”。所谓张目，就是结果。也就是说，政治上采取哪种表述方式，很大程度上直接根据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就事论事。毛的这个表述方式，相当典型地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从属于政治。同时，由于政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因此，相关的政治表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地而异”。

〔1〕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98页。

但是，科学则不同，就性质而论，科学只能着眼于问题本身，只能就事论事，无须顾及其他，也不能从属于其他。这就是说，上面那种把半法西斯称为法西斯这一类问题，在科学研究领域是不允许发生和存在的。一句话，科学是不能随地而异的。

这里所说的科学，具体指学术。政治与学术，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别和范畴，因此，两者在性质上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既然性质不同，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某个具体的问题上，有的时候两者肯定不能统一。上述关于国民党的定性，其实，就是一个两者不能统一的典型例证。既然毛泽东自己尚且不能将政治与科学彻底统一，那么，两者可以按照各自的运行规则，各说各的。

笔者自踏入中华民国史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至少在主观上始终按照学术的本质从事治学，因此笔者的作品大都具有原创意义。

恩格斯在他 24 岁那年，写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92 年，当该书再版时，恩格斯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他在再版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1〕

《民国的政治逻辑》这部文集，收入了笔者 1980 年至 2010 年的主要作品。其中，早期作品的个别用语不甚恰当，个别概念也不甚准确，留下了笔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总体而言，笔者并不脸红。这一次辑集出版，除去个别错字，正文概不改动，仅对少数几处注释略加补充，但均注明补记的时间。总之，那些青年时代的痕迹一点也没有抹去。

另外，早期作品在注释上不甚规范，有些引文的出处没有注全，此次出版尽力补齐。但因时间仓促，直至发稿之前这项工作仍未做完，这绝对是本书的一个缺陷。

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邓 野

2010 年 8 月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367 页。

目 录

第 一 辑

- 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 /3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 /18
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 /37

第 二 辑

- 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 /59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90
《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 /118
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
——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 /142
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172
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 /192

第 三 辑

- 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217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241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 /267

▶ 民国的政治逻辑

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 /294

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323

1944—1946 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 /349

第四辑

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 /379

论抗战初期的陈独秀 /399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 /411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442

第五辑

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 /467

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流产与非议 /471

《毛泽东选集》所收《学习和时局》一文时间与史实的出入 /477

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 /480

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486

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主义及其实践

工读互助主义与它的化身——工读互助团，兴起于1919年底，1921年以后便逐渐消逝。在百家争鸣的五四时代，它并不显赫一时，它的存在与影响始终是较为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这一思潮或赞助过这一运动，可以说，他们正是这一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

在五四运动前后这段时间，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早期共产主义者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他们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均带有若干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工读互助主义的实践上。同样，对工读互助主义由接受到摒弃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由早期共产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这里。

—

工读互助主义是五四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以后，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和摒弃、对新社会向往和追求的结果。王光祈在发起工读互助团时写到：欧战后，中国青年“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1〕。工读互助主义正是在进步青年要求新生活的急切愿望下，作为一种新社会、

〔1〕 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369页。

新制度、新生活的模式，应运而生。

工读互助主义是把五四时期一部分现成的社会思潮简单地加以综合而形成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互助主义。《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的主要著作之一，其理论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克鲁泡特金在方法论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也是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考察人类社会的。但同达尔文主义和为人所引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反，克氏认为：“竞争既不是动物界间之规则，也不是人们间之规则”〔1〕，认为互助互援才是一切生物与人类社会进化的要素和自然法则。这一论点当时被称为“新进化论”。如果说“五四”以前，以《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在五四时期，随着人们对借口“生存竞争”而进行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厌弃，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否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转而接受以《互助论》为代表的“新进化论”。恽代英就认为：“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2〕1917年10月，恽代英等成立“互助社”，指出：“定名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3〕

早期共产主义者是把“互助论”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接受过来的，并视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李大钊写到：社会主义“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做基础”〔4〕。恽代英则是首先根据互助论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他通过对生物互助的分析，认为“我们应当从生物进化方面看出人类只应该遵循社会主义的生活”〔5〕。互助论对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十分广泛，主要有三点：首先，互助是生物、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李大钊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6〕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成员指出：“互助是社会进化的要件，所以人和人要互助，促成社会的进化。”〔7〕其次，互助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人类独立生活是不能够的，必定要互助才行……我们现

〔1〕 周佛海译：《互助论》，万有文库版，第1册，85页。

〔2〕 《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2卷5期。

〔3〕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册，118页。

〔4〕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30页。

〔5〕 《我的宗教观》，《少年中国》2卷8期。

〔6〕 《李大钊选集》，222页。

〔7〕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424页。

在就要研究互助（共同生活）”〔1〕。工读互助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实验共同生活。其三，互助是一种新人生观。向警予写道：“二十世纪的新人生观，是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来替代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2〕综上所述，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互助论占有一定成分。

（二）工读主义。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开设豆腐公司，1915年夏，又为华工办一勤工俭学会，后来也帮助那些在欧战期间收不到汇款的留法学生，让他们一边做工，一边维持学业。战后，这一方法经蔡元培、吴稚晖等大力宣传和推广，在国内逐渐形成一种政治思潮。当时，“劳工神圣”的口号风行一时，进步青年开始寻找一种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道路，他们选择了“工读”这一形式。与李石曾等对“工读”的解释，即“勤于做工，俭以求学”相反，他们予以新的解释，称之为“工读主义”。新民学会成员萧子暉（即萧三）指出：“勤工俭学，是一种主义”，绝不是“替人家省钱读书，勉强做一回工人，再还他学生老爷的面目去”。他明确地说：“工人学生两种人，应合而为一，才是新世界的生存者。”〔3〕显然，他把这一形式看做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合而为一”的道路。“工读”的另一意义，如李维汉所说：“工是用体力的，学是用脑力的……工学却互有关系，互用乃成。”〔4〕这是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解释。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赵世炎于1919年12月在北京创办《工读》半月刊，并与稍后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四组保持密切联系。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看来，只要采取“工读”的形式，再加上新的解释，上述问题就解决了。

（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区别于五四时期其他社会思潮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同恩格斯评价欧文的共产主义一样，工读互助主义也是始终保持着实践的性质的。而这个特点则直接来自日本的新村主义。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开始在国内比较全面地介绍新村主义。新村里那种四十几亩地、二十几个人、几所房子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提

〔1〕《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475页。

〔2〕《向警予文集》，49页。

〔3〕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297、298页。

〔4〕同上，80页。

供了一种“超出”社会之外的，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经济共同体形式，它似乎也提供了一种没有强权、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差别、没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的理想社会的雏形；同时，也为急于求得新生活的中国进步青年，提供了一种在小范围内能够立即实现共产新生活的实践依据。新村主义很快流传开来，李大钊、毛泽东、黄日葵、恽代英等都曾撰文讨论、介绍或宣传新村，毛泽东与蔡和森曾亲往岳麓山勘查建立新村的地点。但建立新村有两个问题：首先，需要一块土地。这在旧中国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情况下，是难以办到的，沈玄庐当时便认为：非地主不能组织新村。^{〔1〕}其次，这批青年大多生活在城市，不便在农村展开活动。这就必须将新村的形式改变，以适应上述情况。王光祈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提出了工读互助团这一适应“城市中的新生活”的主张。因为“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2〕}，所以，早已在研究、讨论、设计新村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迅速地接受了工读互助团的主张。可见，工读互助团是直接由新村主义派生出来的。

将以上三方面总括起来看，“互助”是思想基础，“工读”是具体形式，“新村”是实践依据，把这些现成的社会思潮加以参考、综合与某种意义的“升华”，便形成了工读互助主义。

工读互助主义设计了一种理想的工读互助社会，即“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3〕}。这显然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范畴，但绝无西方空想社会主义那样完整而系统，也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它只是在简单地指出社会弊病之后，直截了当地拿出几条措施，然后立即付诸实行。由此看来，称它为“主义”已是过誉了，事实上它不过是个粗糙的行动纲领而已。

推行工读互助主义的道路，是《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的，“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就是组织一个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团体，名曰工读互助团。^{〔4〕}它具有以下几个作用：通过共产的集体生活的示范来启发社会，引导社会；通过这种小团体的扩张或大联合

〔1〕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89页。

〔2〕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372页。

〔3〕 同上，379页。

〔4〕 王光祈与蔡元培在名称上有分歧，因此有的称“工读互助团”或“工学互助主义”。

来实现社会变革；依靠小团体的力量摆脱社会剥削，并抗衡社会压力。恽代英在他的《未来之梦》中论述了这条道路，他说：“我们的意思，要改造这个世界，一须做一个共同生活的模型，使世人知道合理、有幸福的生活是可能的事。一须我们大家协力，不但解决自己及家庭生活问题，而且要有力量与资本家决斗。怎样能与资本家决斗呢？固然我们可以组织工会，鼓吹罢工，用阶级战争为推倒资本家的方法；但我想要为世界求一个最后的解决，仅仅靠鼓动争存的单纯天性总还不够。最好莫如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1〕在这里，恽代英显然把阶级斗争学说归之于达尔文学说中生物争存的天性而一同抛开了，他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至于建设一个大资本来压服资本家的说法，只能用他在标题中所说的“梦”来解释了。革命道路与革命手段问题，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普遍未解决的问题。互助论从政治上讲，首先是否定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也赞赏“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因此，他们对于工读互助团这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2〕道路，是易于接受的。

恩格斯指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3〕。工读互助主义正是这种“思维着的理性”的产物，而工读互助团则正是这种“典型示范”。

二

1919年12月4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首先提出工读互助团的主张。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量后，立即着手组织，不到一个月便组织成功，“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4〕。

〔1〕《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册，195、196页。

〔2〕同上，第2册，379页。

〔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99页。

〔4〕《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370页。

北京工读互助团先后成立了四个组，其中第三组为女子组，也称女子工读互助团，参加者有缪伯英^[1]等。参加其他组的有何孟雄、陈公培，以及后来成为湖南劳工领袖的黄爱^[2]，还有罗汉、刘伯庄等（罗、刘二人后来均成为托派分子）。

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后，王光祈便写信给余家菊、恽代英，盼望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3]而恽代英恰有这一打算，他在1919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看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4]不久，他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5]。

毛泽东与蔡和森虽早在寻找建立新村的地点，但因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参观了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6]！同年3月，他与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左舜生、张国焘、刘清扬、彭璜、萧子暲等26人联名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7]同

[1] 缪伯英，湖南人，1919年7月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1921年与何孟雄结婚，担任过中共北方区妇女部长等职，1929年4月在上海病逝。

[2] 《黄爱事略》，《血钟》，1922年5月。

[3]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册，126页。

[4] 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678页。

[5] 利群书社属工读互助团性质。利群书社1920年1月发表的“宣言”指出：书社是“于城市中组织一部分财产公有的新生活”，“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机会”，“有一个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五四时期社团》，第1册，133页）。恽代英自己也说：“利群书社是工读互助团性质相近的东西”（《五四时期社团》，第2册，445页）。董必武后来在谈到利群书社时也指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乌托邦的”，“他们的兴趣在于进行新农村运动”（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

[6] 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62页。

[7] 毛泽东等人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因受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迅速失败的影响而没有成立。1920年秋，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内又成立了一个上海工读互助团，但与毛泽东等人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已无关系。笔者从一些零星材料中看到，参加该团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等人。该团的性质，可能是纯半工半读性质，以解决外国语学社学生赴俄前的生活问题，可能不是共产团体。近几年来，萧劲光在数次回忆中均谈到他在外国语学社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唯有一次写道：“到上海后，我和弼时同志一起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等二十六人在上海发起的工读互助团。”（《赴苏学习前后》，第3辑）其实，毛泽东等人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并未成立。毛泽东1920年6月7日在上海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这个团的主要发起人、新民学会成员彭璜在1920年6月8日致友人信中也说：“上海的工读团失败，就是我组织的失败。”（《五四时期社团》，第2册，455页）可见确未成立。萧劲光说参加了毛泽东等26人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一语，恐系采访整理者所为。

时致信周士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人的生活。”“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1〕

此外，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还成立了一些名称相同或不相同的类似团体。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进步青年中燃起无限希望，陈公培曾作诗赞曰：

不要忘记，汉花园中已经有我们造成的光明一丝……几
缕……〔2〕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3〕工读互助团，的确是当时把改造社会的理想付诸实践的主要团体，它在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上也是颇有特点的。

工读互助团是以一种营业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内部“是一种共有财产的组织，而对外仍是一种营业竞争”〔4〕。利群书社也毫不含糊地表明过这一点。他们经办多种营业项目，如食堂、洗衣、印刷、贩卖书报等，并制订了周密的经营计划，以营业收入维持新生活。利群书社开办时，经费仅二十元加三十五串文，而恽代英通过各种营业设想和包括利息在内的精心计算，画出这样一幅蓝图：一所二十间的房屋，四五年间便可在乡村建成，并有图书室和游戏室，最后发展到有自己的工厂、商店、农场、学校，每日工作四小时，衣食住完全由团体供给。唯一的限制是，“只可布衣，不过二十岁不着羊裘”〔5〕。恩格斯说过：“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6〕工读互助团，以它惊人相似的面目，再现了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方式，只是规模更小，方式更简单，幻想的破灭也更快。

〔1〕《新民学会资料》，64、65页。

〔2〕《寄〈工读互助团〉底朋友们》，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4月7日。署名“吴明”，即陈公培。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46、47页。

〔4〕《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415页。

〔5〕同上，第1册，190页。

〔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3页。

“原则”，是指导团内生活的唯一依据。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团员说：“我们既然主张决定试验新生活，那便专对这个方向进行”，“凡是理想社会所当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1〕。各地工读互助团在具体做法上不尽相同，而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则是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组织上最典型、政治上最有代表性的团体，这里不妨以其为主，择要介绍新生活的几个侧面。

私有制是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以为社会一切罪恶都由私产制度发生，要免除这种罪恶，惟有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2〕他们轻易地“打破”了私有制，规定团内一切财产公有，团员的一切劳动所得公有，甚至把团员的个人财物也充公。反过来，团员的一切生活所需，大至衣、食、住，小至配眼镜、皮鞋油、茶叶、牙粉等费用，也一概由团体供给。

他们提倡各尽所能，并举例说：“譬如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3〕不过谁也不怀疑，这种要求除写在纸上外，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他们也曾实行各取所需，就是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任何人可以随意拿来穿，“各取所需”，不过如此耳。

在政治上，团员完全平等，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全体团员共同议决。团员享受“充分”的自由，“内部一切杂务，如会计、书记、庶务、交际等类，都由各人自己认定”〔4〕。当然，只要越出团体一步之遥，平等与自由便会“不翼而飞”。

团员必须做工，四、五、六小时不等，何孟雄便在食堂做过“跑堂”；必须读书学习，“至于未入团以前，曾经受过教育与否，在所不问”。总之，“必工必读”〔5〕。

家庭与婚姻问题，是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他们认为：“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于是“毅然决然和家庭脱离关系，犯天下的大不韪而不避”！在婚姻问题上，他们同样采取了“彻底”措施，“对于从

〔1〕《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432、433页。

〔2〕同上，432页。

〔3〕同上，377页。

〔4〕同上，431页。

〔5〕同上，377页。

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张和对方脱离关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1〕。利群书社对此则采取另一种办法，计划“将同人有妻室的酌量搬到此处，租个大屋，住居一处”〔2〕。他们似乎也做过一番努力，但，“可惜垂成而败”〔3〕。

与新生活相适应，工读互助团特别要求团员思想、意识、良心、人格的纯洁，并视为成败的关键。李大钊一开始就强调说：“经济方面尚无碍，精神方面尤为重要。”〔4〕毛泽东也认为，成败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5〕。利群书社十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在每晚的日会上，每人报告当天做的利群助人的事，并反省过失。沪滨工读互助团也指出，实现他们的理想，“只要以良心为轨道，以人格为权衡……就可以了，就能够了”〔6〕。这种主张“闭门思过”，从而达到人格的修养和锻炼的办法，在当时的一代进步青年中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北京工读互助团把上面这些理想社会“所当做的事情”都做起来后，一度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7〕但就在此时，一向为人们忽视的工读互助团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导致这一充满理性和正义色彩的新生活运动迅速崩溃。这正是李大钊认为“尚无可虑”的经济问题。

前面讲过，工读互助团直接脱胎于新村的独立生产、独立消费的经济共同体形式，他们的全部新生活实践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他们的设想是：“生产、消耗都是经自己做来做去，就是自己靠自己了……自己既然靠自己，当然不靠别人。不靠别人，就件件都自由了。”企图在这种经济共同体内摆脱与旧社会的一切关系，自然是不现实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在实践中发现，他们做的工作，“都不是独立的工作，都不是做了工就有饭吃的工作”〔8〕。他们办了食堂，无奈生意欠佳，每日亏损一元五角；他们替人洗衣，但在一家洗衣局的竞争下，三四天还收不

〔1〕《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433页。

〔2〕同上，第1册，136页。

〔3〕同上，第1册，189页。

〔4〕同上，第2册，380页。

〔5〕《新民学会资料》，62页。

〔6〕《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459页。

〔7〕同上，434页。

〔8〕同上，435页。

到二十件衣服。诸如此类的问题，造成经营一再亏本，难以维持。这时他们才明白，他们的一切活动是必须受社会制约的，社会的束缚“使我们工读互助团根本不能动弹”〔1〕。在这种情况下，团员的情绪也迅速降至冰点，“感情大坏，精神愈散”，新生活的一切魅力似乎也全然失去，以至“除出一二人以外，都不愿去维持他”〔2〕。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自行解散，前后仅存在三个月左右。

利群书社维持的时间长一些，但并非特别幸运。它既没有建立什么压服资本家的大资本，也谈不上对社会有丝毫启示，如恽代英所说：“我们戒慎恐惧的过日子”，“我们真饱受了经济压迫的况味”〔3〕。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四组也继续支撑了一段时间，并于1920年9月生产出商标为“工读”的毛巾和袜子，但此后便很少见到它的活动。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在惨淡经营数月后，于1921年2月自行解散；天津工读互助团则被“当局”解散；还有一些工读互助团在筹备期间便夭折了。1920年下半年，这一运动已失去发展势头。1921年起，便逐渐销声匿迹，事实上，也就是在1920年夏季前后，活跃过大半年的时间。

三

王光祈把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归之于“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事，别无他故”〔4〕。而早期共产主义者则从失败中逐步获得了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教益。

（一）对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

工读互助主义首先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恽代英说：“理想者，事实之母也。”〔5〕工读互助主义者对于理想社会总是急于求成，公开主张“由轻而易举的办法办起”〔6〕。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选择了较之新

〔1〕《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436页。

〔2〕同上，第2册，435页。

〔3〕同上，第2册，446页。

〔4〕同上，第2册，415页。

〔5〕同上，第1册，182页。

〔6〕同上，第1册，125、126页。